

# 近代中国公司的 移植性制度变迁研究

张兵 著

A STUDY ON  
THE TRANSPLANTING  
CHANGES OF MODERN CHINESE  
CORPORATION INSTITUTION

科学出版社

# 近代中國公司的 移植性制度變遷研究

王健

著

■

王健

著

■

王健

著

■

王健

著

■

王健

著

■

王健

著

■

王健

著

■

王健

著

WANG JIAN ON  
THE TRANSPLANTATION  
OF MODERN CORPORATE  
INSTITUTIONS

WANG JIAN

# 近代中国公司的 移植性制度变迁研究

张兵 著

A STUDY ON  
THE TRANSPLANTING  
CHANGES OF MODERN CHINESE  
CORPORATION INSTITUTIO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公司的移植性制度变迁研究 / 张兵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 - 7 - 5203 - 0683 - 6

I. ①近… II. ①张… III. ①公司—企业制度—经济史—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F279.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63700 号

---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赵 丽  
责任校对 王佳玉  
责任印制 王 超

---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3.75  
插 页 2  
字 数 211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如何建立有效的制度，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内生诱致性制度变迁（格瑞夫）与强制性制度变迁（林毅夫）、制度建构（诺思）与制度演化（哈耶克）的争论不绝于耳。西欧世界的兴起好像为内生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制度演化提供了绝好的例证，而卡塔琳娜·皮斯托、约拉姆·凯南等人的研究结论——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之所以制度移植成功，主要是因为移植了人，正是这些移民定居者带入、继承和发展了母国的法律制度——更似乎宣判制度移植与制度建构的死刑。从这个绝对意义上来讲，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完全是命中注定，要改变落后局面好像也只能靠等待。然而纵观历史，任何辉煌的世界文明都是在文化和经济大交流、大碰撞的时代创造的，制度学习与制度移植一刻没有停止过，这是制度变迁的最常态，否认和忽略对它的研究都将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大遗漏。不可否认，制度移植确实经常无效率，但并不能因此否认和放弃对制度学习和制度移植的研究，相反如何促进有效制度移植，更应该成为制度经济学现实所要关切的重大课题。

近代中国公司制度始于制度移植，经历近 80 年的发展与演化，有成功也有失败，这对于研究制度学习和制度移植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该书作者在前人历史资料整理、收集和分析的基础之上，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结合制度互补性和制度学习理论，大胆假设构建了移植性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对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移植及其演变逻辑进行尝试性分析，这无论是在制度移植研究还是在中国近

代经济史研究中都是一种大胆的尝试，颇具新意。

作者根据制度移植分析框架，将制度移植划分为制度嫁接和制度调整，并据此将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移植过程划分为三大阶段：

一为制度嫁接阶段，即官督商办特许公司制度的建立。列强入侵，给中国传统航运业和国家安全造成巨额损失，轮船运输以及西方公司制度带来的潜在收益改变了原有制度均衡状态，产生制度需求。政府主导推动了制度嫁接，将洋商的特许制度、集资募股与中国传统盐业中的“官督商卖”相结合，产生了官督商办特许公司制度形式。这种制度形式基本实现了从社会筹集资本，利用机器和雇用劳动力进行生产，与洋商分利等制度目标。然而，该制度既不是当时最优制度选择（各国已经颁布了公司法进入准则主义公司制度时期），又受制于官督与第二方集体监督机制制约，股东大会（资本）的作用有限，权力也难以得到保障。引入制度与其他制度要素之间缺乏互补性，制度效率较低。

二为制度调整阶段，即准则主义公司制度的建立。随着相关知识存量的增加，其他相关制度如股票市场和现代银行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以及商人和商会实力的增强，人们对特许与准则主义公司制度的净收益进行了重新评估，提出新的制度变迁需求。在商会的推动下，公司股权制、法人代表制、注册制、有限责任、治理结构等都随之建立和完善起来。这种外生制度嫁接引发的内生制度创新实现了制度间的互补，制度配置效率和适应性效率大幅度提高，制度移植趋于成功。不过，这一时期政治制度不稳定给公司制度发展带来巨大风险。

三为制度再调整阶段，即国有垄断公司制度的建立。受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计划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南京政府强制推行中央银行制度与货币制度改革，整顿与改组商会，强行推动国有垄断大型公司制度。该制度降低了公司创始人人数限制，扩大公司控股规模，取消对大股东表决权的限制，由自然人代表政府或公司法人充任公司董事或监察人等，使国家权力凌驾于民营资本之上，与民争利，从而造成民营经济衰退和经济崩溃。制度移植失败。

作者尝试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来分析近代中国公司制度变

迁的逻辑和相关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诺思等新制度经济史学者的历史研究范围（西欧和拉美国家）的重要补充，同时也是对近代中国公司制度史研究方法的一次大胆尝试。

首先，作者从中观制度出发，在整体论和系统论的基础上讨论制度移植，而不是把视野仅局限在单一制度规则上。在第二章作者将制度定义为制度束，是由显性规则、隐性规则、实施机制以及与其他制度关系四个部分组成的共同信念系统，是博弈均衡。该定义充分考虑了规则与文化、规则与实施机制以及规则与规则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后三者对于前者选择集合、演进轨迹以及绩效的影响。作者指出可移植的只有目标国的显性规则，这种规则与引入国的隐性规则、实施机制以及与其他相关制度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制度移植效率与制度调整的方向，并借此分析与阐释“制度移植何以经常无效率”，得出隐性规则、实施机制以及相关制度制约着制度选择集合，其矛盾运动方向决定着制度移植成功与否的结论。

其次，作者引入制度经济学理论，将制度移植视为包括制度嫁接和制度调整的一个制度变迁过程，尝试着运用制度变迁、制度演化、制度互补、成本收益分析与博弈论等经济学理论对近代中国公司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进行梳理与阐释。这在近代公司制度史研究方法上是一个大胆的尝试。比如，针对清末在众多准则主义公司制度中为何选择官督商办特许公司制度这一问题，作者分析了华商、清政府与外商集团各自的成本收益以及它们之间的博弈与最优选择，并指出中国当时缺乏商法、商律等制度体系及其实施机制，嫁接准则主义公司制度的实施成本显然要高于特许公司制度；对公司制度的认知水平和知识存量也有局限，使得制度供给者对二者的预期收益评价几乎没有区别；再加上清政府在盐业上官督商卖制度的路径依赖性，于是，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特许公司制度便成为当时的最优选择。

再次，作者没有从制度建构单一角度研究制度移植，而将其视为制度建构与制度演化相互作用的结果。制度建构（以诺思为代表）与制度演化（以哈耶克为代表）是制度经济学上的重要论争之一。有人甚至以诺思探讨学习经济学，是对制度建构的放弃，而宣告制度

建构的失败。然而，这种争论就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一样很难有定论。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制度也是一种知识，它是人们在环境反馈之前对环境所作的预测或期望。因此，Paul D. Bush 提出，知识存量的增长是制度变迁的原动力，知识增长与现行价值观念结构之间的矛盾和协调关系决定了制度变迁的各种方式。那么，知识又何来？它既可以是内生的不断积累，也可以是外生的补充或替代。正是基于此认识，作者认为制度建构中有制度演化，制度演化又推动制度建构。面对外生冲击和制度变迁需求，清朝当时现有的知识存量和认识决定了它们选择次优（特许公司制度）而非最优（准则主义公司制度）制度进行嫁接；而当人们对公司制度的认知不断加深，知识存量增加到足以改变制度供给者成本收益时，内生性制度调整（准则主义公司制度）由此产生。因此，作者并不因为最初可能会选择次优制度而排斥制度嫁接。相反，她认为制度嫁接是现代制度变迁最普遍也是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因为这样的制度供给必然刺激人们学习，知识存量会不断扩大，从而内生地诱致最优制度变迁。用制度建构与制度演化相互作用来分析制度变迁，一方面克服了制度建构的单一性和非协调性，另一方面也克服了制度演化的消极性。

第四，国家制度也是制度，也会受到非正式制度（文化）、实施机制和与其他制度关系的制约；国家制度变迁也是制度建构与制度演化相互作用的结果；国家制度变迁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开放性的学习。诺思提出了国家悖论，哈耶克提出了良序的宪政国家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在历史上我们既能看到建构的宪政制度不尽如人意，例如俄罗斯解体后的宪政制度建构；又能看到宪政制度演化的失败，例如中华民国初建时期的宪政制度。作者在第四章分析了政府如何与华商和外商之间博弈并主导了特许公司制度嫁接，在第五章讨论了中央政府权力相对弱化，商人实力增强以及商会如何主导准则主义公司制度调整，在第六章则阐释了中央集权强化下政府利用政治权力对商会和商人利益的褫夺。这充分证实了国家权力受到一定限制，代理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一致时，政府往往是“好”制度变迁的推手，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同时，也可以看到宪政制度作为显性规则也要

受到隐性规则（文化）、实施机制和与其他制度关系的影响。不是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都能建立起良序宪政制度。因此，需要保持开放性的学习，既不排斥外生性制度嫁接，补充或替代内生知识，也要不断进行内生性知识积累，促进制度演化。

按经济学的静态、动态分析方法，也可以把对制度的研究分成“静态制度”分析和“动态制度”分析。经济学中的动态分析，是考虑到时间因素的影响，把经济现象的变化当作一个连续的过程来看待。但是，对于制度研究来说，把“动态制度”分析仅仅看作是对制度变化过程的分析是远远不够的。严格说来，“动态制度”分析不仅是对制度变化过程，即“制度变迁”的分析，还应该包括对“制度移植”的研究。因为，“制度变迁”指的是制度在“纵向上”（时间维度上）的动态变化过程，而“制度移植”则是指制度在“横向上”（空间维度上）的引进、嫁接和融入的过程。显然，无论是纵向的制度变迁，还是横向的制度移植，都是制度的“动态变化”过程，都应该被纳入“动态制度”分析的范畴和体系中，并具有同等的学术意义与地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外学术界对“制度移植”的重视和研究都无法与“制度变迁”相提并论，两者相比可谓天壤之别。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兵博士的新著，从理论与应用两个方面，对制度移植做出了颇有成效的探索和尝试，确是一件难能可贵、可喜可贺的事情！期待作者今后继续加深对“制度移植”相关问题的研究，推出更多、更好的成果和作品。

韩 毅

2017年5月于辽宁大学

# 目 录

|                              |      |
|------------------------------|------|
| 第一章 绪论 .....                 | (1)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1)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3)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与本书框架 .....          | (8)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12) |
| 第二章 移植性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 .....     | (14) |
| 第一节 制度、制度变迁与制度移植 .....       | (14) |
| 第二节 移植性制度变迁的过程模型——一个假说 ..... | (19) |
| 第三节 移植性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 .....  | (29) |
| 第四节 移植性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3) |
| 第五节 小结 .....                 | (42) |
| 第三章 近代中国公司制度嫁接的动因分析 .....    | (44)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的企业制度 .....          | (44) |
| 第二节 外生冲击与制度失衡 .....          | (55) |
| 第三节 制度距离 .....               | (67) |
| 第四节 小结 .....                 | (71) |
| 第四章 制度嫁接：官督商办特许公司制度的建立 ..... | (73) |
| 第一节 华商的制度选择集合及其最优决策 .....    | (73) |

|             |                                          |              |
|-------------|------------------------------------------|--------------|
| 第二节         | 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嫁接 .....                         | (84)         |
| 第三节         | 制度嫁接结果分析 .....                           | (100)        |
| 第四节         | 小结 .....                                 | (109)        |
| <b>第五章</b>  | <b>制度调整：向商办准则主义公司制度的过渡 .....</b>         | <b>(111)</b> |
| 第一节         | 清末民初其他制度要素相继调整 .....                     | (111)        |
| 第二节         | 商会推动下的公司制度调整 .....                       | (127)        |
| 第三节         | 制度调整结果分析 .....                           | (135)        |
| 第四节         | 小结 .....                                 | (146)        |
| <b>第六章</b>  | <b>制度再调整与移植失败：国有垄断公司制度的<br/>扩张 .....</b> | <b>(148)</b> |
| 第一节         | 中央经济控制力的加强 .....                         | (148)        |
| 第二节         | 中央政府强制推行的制度调整 .....                      | (164)        |
| 第三节         | 制度倒退与移植失败 .....                          | (179)        |
| 第四节         | 小结 .....                                 | (184)        |
| <b>第七章</b>  | <b>艰难的移植：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移植的结论<br/>与启示 .....</b> | <b>(186)</b> |
| 第一节         | 艰难的移植：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移植的<br>总体评价 .....          | (186)        |
| 第二节         | 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移植的结论 .....                      | (188)        |
| 第三节         | 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移植的几点启示 .....                    | (194)        |
| <b>参考文献</b> | .....                                    | <b>(199)</b> |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企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单元。公司制度作为企业发展的高级形态，对现代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马克思将其生动地描述为“假如必须等待积累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sup>①</sup>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 诺思则站在经济学理论的高度，从一般意义上提出只有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与制度才能促进经济增长，这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

然而，在古老的中国，传统的业主制和合伙制一直延续到 1840 年，虽也有股份之说，但没有公司之实。此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以及外国公司的大规模竞争，中国开始学习和模仿西方公司制度，建立起独具特色的公司制度。根据性质和基本特征的不同，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的演进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sup>②</sup>：

(1) 官督商办特许公司制度阶段（1873—1904 年）。1873 年，洋务派引入西方特许公司制度，并结合中国盐业传统的“官督商卖”制度，开办了近代中国第一家公司——轮船招商局。中国传统企业制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724 页。

<sup>②</sup> 张忠民等学者认为应当分为准公司、家族公司、企业公司以及国有公司四种类型。本书根据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即产权清晰、权责明确和科学管理，将近代中国公司制度演进划分为三个阶段。

度模式开始向公司制度迈进。这时期的中国公司制度属于特许性质，股权与债权合一（官利制度），治理结构也以官督商办为主。

（2）商办准则主义公司制度阶段（1904年—20世纪30年代末）。1904年，《钦定商律·公司律》的颁布标志着近代中国公司制度从特许主义走向准则主义。随着1914年《公司条例》和1929年《公司法》的接续颁布，现代公司制度——股权制、法人代表制、注册制、公司治理结构、职业经理阶层、科学管理层级结构等逐步完善。民营企业和资本主义经济也取得了相应的发展。虽然其完善程度和实施效率赶不上西方发达国家，但也基本符合世界公司制度发展的总体趋势。

（3）国有垄断大公司制度阶段（20世纪40年代初—1949年）。为满足战时经济需要，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1940年《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条例》和1946年《公司法》，强化了国有垄断大公司的地位和作用。这些公司虽具有法人代表制、注册制、有限责任和公司治理结构等一般特征，但由于国有资本在公司中的特殊地位，公司治理结构基本让位于官僚治理。同时与民争利，商办股份公司或被渗入官股，或被国有公司吞并，或在竞争中衰败，遭受巨大的冲击，经济崩溃。

纵观历史，近代中国公司制度建立了比较现代的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形成了比较先进的职业经理阶层，建立了比较科学的管理体制，虽说不能达到西方公司制度的完善程度和实施水平，但也相去无几。然而，它却并没有给中国创造诸如英国东印度公司般的辉煌，它保留“官利制度”等传统痕迹，甚至在20世纪40年代后，国家通过国有垄断大公司与民争利，造成经济衰退与崩溃。近代中国公司制度是制度模仿和移植的结果，但为什么前期制度发展态势良好，而后期却达不到目标制度效率，以失败告终呢？近代中国公司制度演进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是哪些因素激发了本土制度的内生变迁？又是哪些因素造成了制度移植的失败？

在经济史学领域，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著述颇丰，研究范围较广，然而其制度演进的逻辑却少有人问津。因此，系统全面地考察和研究近代中国公司制度演进的历史，探究制度变迁的动因和逻辑，总

结制度移植的历史经验，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价值。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 30 多个年头，正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克难阶段。中国经济体制中新旧制度杂陈、本土内生与外来移植制度并存，国家与市场同时发挥作用，制度互补与冲突情况非常复杂，如何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推动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便成为当前的核心问题。因此，认真研究近代中国公司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与演进特点，探讨制度移植与制度创新的关系，以及国家对制度发展的影响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 国内的研究现状

企业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单元，因此，企业史研究一直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许多学者为此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例如，新中国成立前陈其田的《山西票庄考略》、大清银行清理处所编撰的《大清银行史》、严中平的《清代云南铜政考》、杨荫溥的《中国交易所论》等；新中国成立后的《永安纺织印染公司》、张后铨主编的《招商局史》、全汉升的《汉冶萍公司史略》和《大生系统企业史》等。这些论著对近代中国各行业、企业的发展沿革进行了系统的历史性描述，为企业制度研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素材，并打下良好基础。

然而，关于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的研究则要晚得多，主要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进行现代公司制度改革后开始的。他们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的组织形态研究。沈祖炜先生的《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和发展》<sup>①</sup>从商业企业、工业企业、金融企业、外资企业几个方面论述了近代中国企业发展的历史轨迹，并探讨了市场竞争、企业家精神、科技进步、通货膨胀以及社会环境对近代中国

---

<sup>①</sup> 沈祖炜：《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和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

企业发展的影响。张忠民先生所著的《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sup>①</sup>较系统地介绍了近代中国公司制度演进的组织形式,他指出,近代中国公司制度先后经历了鸦片战争以前的业主制和合伙制、华商附股、准公司(官督商办企业)、家族公司、企业公司和国有公司几个阶段,并进一步说明了它们的数量分布、类型特点以及股本的筹集方式等。王处辉先生的专著《中国近代企业组织形态的变迁》<sup>②</sup>则详细考察了晚清以来近代中国公司组织形态的演进过程,探讨了近代中国企业组织受连续性因素和非连续性因素(生产设备和科学技术)的影响,通过对公司组织形态与制度环境之互动关系的分析,揭示出近代中国公司兴起和发展中的一些特点。

二是关于近代中国公司制的思想研究。豆建民先生的《中国公司制思想研究》<sup>③</sup>考察了1842—1996年公司制思想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厘清了中国公司制思想的演变线索,并抓住了各个时期的特色思想(比如,近代部分的官督、准则主义、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等),希冀对当今企业改革有所启示。杨勇所著《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演变与制度变迁》<sup>④</sup>一书以1872年作为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和治理制度研究的时间起点,按时间顺序总结评价了晚清时期、民初及北洋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抗日战争时期等各时期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和治理制度的特色。

三是关于近代中国公司法的研究。前面所提到的豆建民、沈祖炜和张忠民在各自的论著中以专题形式论述了近代中国公司法的历史沿革及其作用。郭瑞卿的博士论文《略论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sup>⑤</sup>,从法律史的角度分析了近代中国公司法的产生和发展脉络,以及公司法与公司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江眺所著的《公司法:政府权力与

---

① 张忠民:《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② 王处辉:《中国近代企业组织形态的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③ 豆建民:《中国公司制思想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④ 杨勇:《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演变与制度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⑤ 郭瑞卿:《略论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政法大学,2002年。

商人利益的博弈——以〈公司律〉和〈公司条例〉为中心》<sup>①</sup>集中论述了清末民初两大公司法建立过程中政府权力与商人利益的博弈关系。李玉的《晚清公司制度建设研究》<sup>②</sup>和《北洋政府时期企业制度结构史论》<sup>③</sup>两部书中分别介绍了晚清《公司律》与《公司条例》等近代中国公司法的具体内容及其对公司制度的影响。

四是关于近代中国公司治理的研究。张忠民根据近年来企业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先行考察了《公司律》颁行以前的企业治理结构,然后依次对法人治理结构的演进、委托代理下的职业经理人阶层、公司治理结构下的管理层级安排、公司管理制度的变迁等问题做了颇具深度的考察分析。杨在军的《晚清公司与公司治理》<sup>④</sup>主要是集中在晚清这个特定的历史时间段上,介绍了晚清公司的基本特点,官督商办治理机制等治理模式,以及招商局的具体治理结构等方面的内容。李玉则用比较翔实的史料论证了这一时期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制度、股东会制度、董事和监察人制度以及股票、股息制度等。

此外,还有些作品论述了官利制度、银行与企业的关系以及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等。比如,朱荫贵的《引进与变革:近代中国企业官利制度分析》<sup>⑤</sup>一文论述了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环境条件、近代中国资本市场的高利贷性质和中国悠久的商事习惯是导致官利制度产生和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李一翔的《近代中国银行与企业的关系:1897—1945》<sup>⑥</sup>一书依据大量历史资料,以相关经济理论为指导,对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相互关系的发展过程进行全面的考察与分

① 江眺:《公司法:政府权力与商人利益的博弈——以〈公司律〉和〈公司条例〉为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李玉:《晚清公司制度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③ 李玉:《北洋政府时期企业制度结构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④ 杨在军:《晚清公司与公司治理》,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⑤ 朱荫贵:《引进与变革:近代中国企业官利制度分析》,《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

⑥ 李一翔:《近代中国银行与企业的关系:1897—1945》,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

析,试图说明近代中国的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关系由不密切逐步变得密切起来,从而对中国工业化运动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朱荫贵的专著《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轮船招商局与三菱·日本邮船会社的比较研究》<sup>①</sup>通过招商局与三菱邮船会社的比较,论述了国家在公司兴起、改组等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何立胜的学术专著《中外企业制度嬗变的比较研究》<sup>②</sup>运用规范研究、历史分析、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对中外企业制度要素展开了系统比较研究,分析了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变迁的历程,提出了官利制度在中国存在的普遍性及其原因,以及中国企业制度变迁中制度供给与需求严重不足、封建社会内化因素的阻碍作用以及法制不健全,市场发育不充分和官商勾结风险递增等问题。

## 二 国外的研究现状

国外学术界对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的关注也是由来已久的。例如,1934年日本学者宫下忠雄在东京发表了《中国银行制度史》,1959年樋口弘著述的《日本对华投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等等。新中国成立后,国外学术界对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的研究更是层出不穷。

美国学者费维凯所著的《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sup>③</sup>,从盛宣怀和“官督商办”企业的角度,详细剖析了招商局的经营运作,包括业务管理、组织结构、财务建设、经营特权等,借盛宣怀这一官督代表论述了清末中国公司中的官商关系,以及这种企业制度的弊端。

美国学者陈锦江所著的《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sup>④</sup>,从商人阶级和商会、地方政府以及中央政府三层的逻辑关系出发,论证了清

---

① 朱荫贵:《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轮船招商局与三菱·日本邮船会社的比较研究》,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

② 何立胜:《中外企业制度嬗变的比较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③ [美]费维凯:《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虞和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④ [美]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王笛、张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